

近代 中国

第4辑

上海中山学社 主办
主 编 丁日初
副主编 陈 绛 徐元基 沈祖炜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中山学社主办

近代中国

(第4辑)

主 编 丁日初

副主编 陈 绛 徐元基 沈祖炜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沪)新登字 302 号

责任编辑 方小芬

封面设计 邹越非

近代中国

丁日初 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扬中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2.375 字数 305000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册

ISBN 7-380515-978-5/F·297

定价: 9.00元

《近代中国》编委会

主 任 赵祖康

副主任 丁日初 尚 丁 唐振常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日初 丁凤麟 马克烈 李赣驹

陆 诒 陈 绛 沈祖炜 沈渭滨

尚 丁 杨立强 赵祖康 徐元基

唐振常 翁曙冠 熊月之

目 录

孙中山研究

孙中山与华侨国内投资……………杨立强 戴鞍钢 (1)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中国致公党

建立的历史准备……………陈昌福 (10)

关于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日〕中村哲夫 (20)

孙中山思想发展学理上的重要准备

——跋新发现的一份孙中山购书清单……………姜义华 (28)

辛亥革命研究

辛亥革命与共和知识分子

——对一种传统观点的质疑……………杨天石 (49)

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郭世佑 (64)

辛亥革命、南洋华侨与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林金枝 (78)

海外华人研究

海外华人——一往无前的力量……………陈潮译 蒋士驹校 (107)

从南洋视角看华人经营……………

……………〔澳〕迈克尔·R·戈德利著 陈 绎译 (117)

学术活动报道

“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

国际学术研讨会简介·····	吉 扬 (127)
访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	顾卫民 (132)
香港盛会 四海论学·····	宗 阔 (138)
探讨城市进步与企业发展·····	长 弓 (141)

《李鸿章全集》(新编)编纂工作及资料的爬梳

与研究·····	翁飞 方英 (143)
“帮会与近代上海”学术讨论会简讯·····	(153)
上海中山学社学术活动简讯·····	(154)

书 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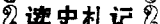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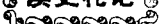
评介《徐州煤矿史》·····	姜 铎 (155)
坎坷的历程 辉煌的人生——读《李嘉诚传》 ·····	陈 同 张忠民 (161)

近代史研究

论19世纪80年代洋行买办的法律地位 ·····	〔日〕本野英一著 徐元基译 蒋士驹校 (167)
实业家与中国传统伦理·····	杜恂诚 (193)
《时务报》三题·····	廖 梅 (215)
徐州会战杂忆·····	陆 诒 (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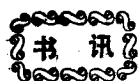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经济中心的历史经验”笔谈 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经济中心的条件·····	丁日初 (232)
从“小苏州”到“大上海”——上海贸易地 位的变化·····	潘君祥 (233)
从金融中心的标志看历史上上海完全金融中	

心的形成·····	洪葭管 (236)
上海形成全国航业和远东航业中心·····	金立成 (241)
近代上海交通的枢纽地位·····	陈正书 (243)
近代上海成为经济中心的工业发展效应·····	黄汉民 (244)
从房地产、公用事业看近代上海成为全国 经济中心·····	沈祖炜 (247)
战时上海的米粮统制 (1937~1945) ·····	张忠民 (253)
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和东南亚华侨·····	
〔日〕小岛淑男著 简柏邨译 丁日初校 (282)	
袁世凯与中国资本主义·····	唐克敏 (297)
1895~1927年中国国内市场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 ·····	沈祖炜 (331)
对开展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董孟雄 (355)
  读史札记  	
招商局售产换旗评议·····	金立成 (363)
  学者介绍  	
姜铎传略·····	徐鼎新 (365)
  对本刊的评议与期待  	
致本刊编辑部书信摘要·····	(375)
我读《近代中国》·····	沈渭滨 (378)

* * * *

编后记.....丁日初 (386)



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汉译本问世.....一览 (250)

《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出版.....一览 (257)

孙中山与华侨国内投资

杨立强 戴鞍钢

孙中山以毕生精力投身于艰苦卓绝的救国斗争，一心希望早日把祖国从苦难深重中解救出来，并求得她的繁荣昌盛。因此，他在领导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同时，特别是在民国建立以后，始终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宣传他的经济主张，倡导他的建设方案，鼓励人们重视和参与祖国的经济建设，并得到众多爱国者的响应。孙中山与华侨国内投资，从一个侧面，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

一

中国人旅居海外，可追溯到较古时期。到了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门被强行打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由于种种原因，相继离乡背井，去海外谋生；其中绝大部分是迫于生计远去他国，不少人则完全是被外国侵略者作为苦力强行掳掠而去。由于中国国势贫弱，再加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侨胞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在海外受尽殖民主义者的欺凌、压榨，很多人客死他乡，遗恨九泉。惨痛的经历，使广大海外华侨的爱国热情分外强烈，他们渴望祖国早日摆脱贫穷落后，走上富强的道路，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或慷慨解囊，或亲赴疆场，支持和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为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立下了卓著功勋，被孙中山尊称为“革命之母”。

华侨久居海外，大多长期置身于资本主义社会，了解、熟悉资本主义各项经济制度的内容和运行机制，有的还积聚了一定的资本，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或经营管理的知识；同时，他们又都有着报效祖国、帮助祖国早日富强的诚挚愿望。还在清末，有的人就已尝试投资国内近代企业，但由于当时国内政治腐败，侨资企业的发展困难重重，不少人望而却步。民国的建立和南京临时政府鼓励和保护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系列法令、条规，为侨资企业的创办展示了令人鼓舞的前景。

孙中山基于对华侨的历史和现状的透彻了解，对鼓励华侨投资国内的经济建设，给予了特别的重视。1912年1月27日，在他的赞许下，国内第一个侨界群众组织——华侨联合会^①在上海成立，明确宣布其宗旨为“联合国外华侨共同一致协助祖国政治、经济、外交之活动”；著名侨商张振勋曾担任该会的名誉会长^②。同年3月，上海富商、同盟会员沈缙云等受孙中山委派，赴南洋各地为拟建的中华实业银行招股，得到当地侨商积极响应，“风声远树，争自激励”，认股者“悉系南洋之大资本家”。^③在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后的一段时期，孙中山将倡导实业建设、包括鼓励华侨投资国内视为当务之急，认为“我们要永远享文明幸福，必先使全国同胞人人有恒业，不啼饥，不号寒，然后云可”。强调：“要想达此目的，就要办理铁路、开矿、工商、农林诸伟大事业”。“但此种伟大事业，决不是少数人责任，定要我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担负，方可达圆满之目的也。”^④孙中山认为，曾对推翻帝制、创立共和做出卓著贡献的海外华侨，是这项伟大建设事业的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1912年7月25日，他于周游各

^① 参见《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721页；《侨务知识手册》，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49页；《广东籍华侨名人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5页。

^② 《实业家之壮游》，载《民立报》1912年10月26日。

^③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32~534页。

省宣传振兴实业的同时，致函同盟会美洲总部诸侨胞，谈了他的想法和期望：“文近日携眷来沪，将有北京之行。容撤除他务，专力于民生实业根本问题，勉践素存宏愿。惟兹事大，非集有力者，群策群力，端能提倡，难于为功。应如何进行之处，一俟规划妥善，通告同人，以求广益集思之效，当与诸公一商榷也。实业根本既定，民生事实方能发生，利国福民无逾于此。热诚如诸公当亦乐观厥成也。”^①次年春赴日本考察实业期间，孙中山向旅日侨胞发表讲演，谆谆勉励道：“（中国）改革虽已成功，惟建设尚在幼稚，我四万万同胞应同心同德，力图建设，以谋富强。”指出：“我国之能否富强，实系乎我同胞之能否负国民之责任耳”^②。

应该指出，以往论者常常指摘孙中山在卸任后一味沉湎于倡导实业，忘却了政权这时已落入袁世凯之手，有本末倒置之嫌。实际上，且不说袁世凯的反动面目有一个暴露的过程，单就孙中山强调在人民夺取政权后（尽管他在这一点上认识有偏差），应当及时地将经济建设推上首位的思想而言，是有其不可忽视的合理内涵和积极意义的。况且孙中山对当时形势的认识并非那么简单，1912年8月他在致宋教仁的一封信中曾深沉地说：“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上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③说明孙中山当时致力于振兴实业，是有其深远考虑的，尽管这种考虑不无缺陷，但其中的合理成份仍应予以充分注意。也正因为这样，孙中山振兴实业的主张，在当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孙中山先生书信四件》，《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第6页。

② 《孙文先生东游纪念写真帖》，转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85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4页。

时社会得到很大反响。其中，海外侨胞的态度是积极的，也是引人瞩目的。

1913年初，旅居爪哇岛和斯玛兰岛的侨商联合南洋各地侨商，组成“华侨祖国救财团”，议定“华侨各东家捐全体财产二十分之一，各雇工于五年间每年捐一月份之雇价”，共捐八千万元，

“此项捐款专供扩充海陆军、兴办实业之用”^①。稍后不久，南洋、美洲侨商徐锐、吴世荣、丘醒虎、邝尧阶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同仁民生实业会”，宗旨是“注重民生，在在维持协助，对于已办之实业极力保护，未办之实业设法提倡”。并在国内各省设有分会，至同年3月底，“外洋华侨入会者，已有二十余万人之多”^②。5月15日，孙中山参与筹划的中华实业银行在上海正式开业，孙中山被推举为名誉总董，总理沈缙云，协理吴世荣，经理席缙华。该行额定资本600万元，实收四成，主要来自侨资，“以振兴中华实业，便利南洋各埠华侨经营内地实业为宗旨”^③。

二

正当孙中山着意致力于振兴实业时，以“宋案”为标志，国内政局逆转。“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被迫又一次流亡海外，再度举起革命义旗。这期间，他不管斗争多么险恶，鼓励华侨振兴祖国经济的夙愿仍时刻萦绕其心头。1916年形势稍有转机，他就致函美洲中华会馆倾吐衷肠：

“兹将迩来所办之事，撮其要旨，以为诸君告。其一，

① 《申报》1913年1月21日。

② 《时报》1913年3月29日。

③ 《中华实业银行始末》，《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6期；《近代上海大事记》，第753页。

罢兵以后，弟即拟振兴实业，杜绝漏卮。初念先办银行，为各种实业倡始。惟兹事体大，必须厚集资本，现正在磋商中。若此事能成，一可以利侨商汇兑，二可以便侨商贮蓄，三可以助各种实业之发达。拟集股先自侨友始，将来章程编定，当即寄上，以俾核夺。又归国华侨，每苦无业，须妥筹安插。现欲择内地矿山之尤者一二区，先筹开办，并于长江一带，择地开垦。如办理得宜，获利必厚，经派妥人调查，俟有头绪，当以奉告。其二，拟在上海建设华侨会馆，为侨胞与内地交际之机关，凡工商事业，借此地以为调查联络之所，使华侨尽知各种天然利源，生财机会不至为外人捷足。其会馆规模，必期宏大，组织必期完备，俾华侨归国，有所问津，务使达合华侨之财之智以兴发祖国利源之目的。”^①

殷殷之情，溢于言表。在另一份批示中，他又写道：“现正筹划伊始，欲引导海外侨商返国开发一切利源。”^②

同年5月，孙中山回到国内。受国内政局的制约，他的救国抱负不能得到充分施展，但凡有可能，他便鼓励和帮助华侨国内投资。是年秋冬间，他致函邓泽如，嘱他妥为招待浙江省赴南洋考察实业的专员王孚川等人，并安排他们同当地侨商会面，“俾得详细调查，将来归国报告，鼓舞政府振兴实业、保护华侨之心，必大有所助也。”^③次年5月，湖南有人欲借助华侨资本开采该省锡矿，请求孙中山帮助。孙中山认为“此事既为国家之利，亦为民间兴盛之基”，即致函邓泽如嘱其推荐合适人选回国接洽^④。

① 《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13页。

② 同上，第415页。

③ 同上，第414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页。

1917年6月，孙中山在上海完成并发表《实业计划》一书的“第一计划”，以宏伟的气魄、周密的考虑，具体阐述了开发中国实业的途径、原则和方案，包括修筑海港、建造铁路网和开采煤铁矿源等。孙中山深知，要把这些设想付诸实现，争取华侨资本的支持和参与是十分重要的。他曾亲临祝贺由四位旅美华侨在上海集资创办的化妆品厂开业。到厂参观后，他对各创办人能够回国兴办实业极为嘉许，并对职工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勉励各股东和工人争取更多的海外同胞回国兴办实业。全体员工听了都非常兴奋，鼓掌之声常常把先生的演说打断”。他对来访的著名侨资企业——上海永安公司经理郭彪提出了这样的希望：“永安公司生意十分好，获利甚巨，希望能够将赚得的资金拿来办工厂、办实业，并希望你们也能号召各地华侨拿出更多的资本，回国开办工厂、农场和兴办各种实业。”^①

同年9月孙中山赴广州就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后，不失时机地落实鼓励华侨回国投资事宜。他先是致函邓泽如：“文自光复以还，久欲从事发展国内实业，奈以政局迭起纷扰，竟有志未逮。去夏归国，深悯民生凋敝，亟欲有所计划。”“现粤势已称稳固，拟即着手展拓利源，设立矿务局，以统筹全局矿务。所有矿务章程，重新改订，以惠商利国为宗旨。”嘱熟悉矿务，“且屡年在海外发展巨业，成绩至优”的邓泽如尽快回国主持这项工作。^②后又致函在福建主政的陈炯明，告知东爪哇泗水闽籍华侨杨德麟愿为故乡振兴实业，指出“泗水一埠闽侨为数尤多，富商巨贾居其多数，其中以漳、泉、福、兴籍为最，皆有意为故乡谋进步发展。惟以前闽省官吏多抑勒归国华侨，以致闻风却步”，“此时兄能对归国华侨竭力保护，助其振兴实业，则必联袂归来，……如

① 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19~120、122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98页。

表赞同，请委杨为荷属华侨联络劝导回国振兴实业委员，并给予回国开办实业护照二十张，以便着手进行联络劝导”^①。

孙中山的鼓励和帮助，对促进华侨回国投资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据统计，1895~1911年，华侨投资国内创办企业284家，投资总额50687608元，年平均投资额2981624元；而1911~1919年，投资企业数为1042家，投资总额71232930元，年平均投资额8904116元，与前相比，年平均投资额增长近3倍^②。促成这种增长的因素很多，孙中山的鼓动和关心，当是要素之一。

三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孙中山认为这是大力推进中国经济建设的好时机。他曾致函旅法侨胞，热情鼓励说：“诸君远涉重洋，所游者又为共和先进、民权最发展之法国，耳濡目染，自必得非常之进步。况大战争结束以后，各国皆民气勃兴，诸君感受世界最新之潮流，又得练习最新之科学工业常识；他日此数十万侨胞联袂归来，为宗邦效力，则祖国实业前途之发展、民权之进步，又岂有限量？”^③对回国投资的海外侨胞，孙中山尽其所能，予以帮助。1920年初，加拿大华侨刘礼堂等人回国打算在长江沿岸购地创办近代垦牧企业，特赶到上海当面向孙中山求教。孙中山根据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况，推心置腹地予以指点，认为“苟政治良则极佳，……若买田些少，耕兼住家或无妨；如欲大作置，多买牛、羊、猪、鸡等，即有兵劫。”建议他们不妨去找先前回国因投资农业受挫遭损的朱卓文详细了解后，再作定夺^④。

①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页。

② 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4~45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04页。

孙中山的坦诚，令那几位华侨感动不已。1921年，旅美华侨陈宜禧拟增资展筑广东新宁铁路，也请孙中山指教。孙中山热情予以勉励，并表示“要代他制订一个发展宁阳铁路计划书，使这条铁路可达大洪古海湾，同时要发展大洪古、广海和闸坡一带渔业”^①，使陈宜禧深受鼓舞。新宁铁路是近代中国由民族资产阶级独立修筑和经营的仅有的三条铁路之一^②。后陈宜禧被孙中山委任为筹办铜鼓商埠委员，拟定了修筑斗山至铜鼓铁路的计划。终因资金不足，未果^③。

1923年11月，当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组建革命政权时，即指示在内政部下设立侨务局，负责保护回国华侨、“提倡奖励华侨回国兴办实业”等事项^④，充分体现了他对侨务工作的关心和对鼓励华侨回国的投资的重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近代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孙中山的诸多美好设想屡遭挫折，1925年3月他又不幸病逝。他的“合华侨之财之智以兴发祖国利源”的宏愿，只能留待后人去完成。

新中国的成立，为海外华侨实现报效祖国、帮助祖国富强的愿望，铺平了道路。但很长一段时期，受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人们对华侨问题一直没有正确的认识，以致严重挫伤了广大海外华侨的爱国热情和建设祖国的积极性，教训是深刻的，后果是严重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立了实事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在华侨问题上存在的种种错误认识，也得到了澄清，极大地激发了华侨的爱国爱乡报效祖国的热忱，他们已成为促进祖国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

① 马潮前揭文，《孙中山平生事业追忆录》第130页。

② 另两条分别是福建的漳厦铁路和龙溪轻便铁路。

③ 参见刘玉遵等：《华侨，新宁铁路与台山》，《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④ 《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9页。

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据统计，从1979年到1988年上半年，海外华侨、华人在中国大陆的投资总额达52亿多美元，占同期外商在华投资总额的一半多；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上去考察，这个投资数额比近代华侨80多年（1862—1949）在中国大陆投资总额整整多40倍^①。以后，势头有增无减，持续上升。以上海为例，截至1992年底，全市批准的外资3200个项目、协议外资金额66亿美元中，就有70%的项目、60%的外资，是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投入的^②。

更令海外华侨振奋的是，邓小平南巡期间，再次充分肯定了广大侨胞对祖国现代化事业所做的贡献。1993年1月22日，他在上海指出：“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③可以预期，随着祖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华侨对祖国现代化建设的贡献将越来越大，孙中山生前孜孜以求的集合华侨在内的全体炎黄子孙的力量，使祖国繁荣昌盛的夙愿，必定能够实现。

（杨立强，男，1939年生，复旦大学文博学院副院长、历史系主任；戴鞍钢，男，1955年生，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

① 《新闻报》1988年6月20日。

② 《解放日报》1993年4月18日。

③ 《解放日报》1993年1月23日。